

外公陈望道的言传与身教

□ 季清如

2020年是外公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发表100周年。再一次回忆祖辈铸就的辉煌业绩，再一次迈入祖辈留下的故居，再一次面对祖辈的音容笑貌，再一次打开祖辈书写的历史篇章，无不深切地为之感动。

“非常希望尽早地把这些山炸平”

外公出生在浙江义乌分水塘，16岁时由父母包办与外婆张六妹结婚，生育两男两女。不幸的是，两男早夭，只剩下两女，我是次女陈次莲的女儿。1949年下半年，外公将弟弟的儿子陈振新收为养子。

1919年5月，外公在日本留学。他从《朝日新闻》上得知北平发生抗议不平等条约的运动，便毅然决然地中止学业回国，来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即现在的杭州高级中学）任国文教员。在三尺讲台上，他积极宣讲新文化，支持创办进步刊物，引导学生们追求科学、民主。

“一师风潮”使外公深刻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实施都是劳而无效的。此时，他收到了邵力子的来信，得知要他翻译《共产党宣言》。接受任务的外公便回到了老家，在一间简陋的老房子里，一盏油灯、一块木板，花了比平时多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潜心翻译。

外公的母亲张翠娟思想开明，虽然不知道儿子在做什么，但总是默默地给予支持。“误把墨汁当红糖吃”的故事，就发生在外公母子身上。

几个月后，《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火种从此点亮了古老的东方大国。它影响和培育了无数先进分子投身革命，为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1920年8月，外公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外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终身不变的。他不仅参加“红色学府”上海大学的工作，支持学生运动，为党培养大量生力军，还继承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提倡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倡导白话文运动。

外公还是资深的教育家、语言学家，对语文教育、修辞学、新闻学有开创性贡献。作为复旦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他深知教育乃一国之本，并以追求真理的务实态度治学，为复旦大学成为一流大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记得外公曾经感叹：（家乡）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孩子们每天都要走几十里山路翻山越岭地去上学。年轻时，我非常希望尽早地把这些山炸平，那样村民和孩子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也可以接触到外面的新事物而不至于成为“井底之蛙”。

外公还对当时家乡落后的教育面貌感触良多。

比如，孩子们看书不会断句，也不懂得标点符号。“标点放的位置不一样，意思完全不同，不懂得标点符号就无法正确领会文章和句子的含义。”

再如，孩子们不懂得修辞，不懂得如何使

用一些虚字，从而也就不会正确地表达内心想法。为此，外公特意编了一些“教材”，一个个教，一个个纠正。这就是他日后致力于研究中国语言的一个最初动力。

“这是天大的善事，要坚持做下去”

外公在对旧婚姻制度进行批判的同时，大力倡导妇女解放运动。他认为，恋爱是道德观的融合；真正婚姻的结合，当然应该是直接的内心的结合。

1921年6月21日，外公在给好友刘大白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近日的悲观，大半是为吾妹因婚事夭折，你晓得我的泪是不肯轻易流泻的，这次我竟几次啜泣呢，我满身浸着我也在其中的婚姻制度的罪恶的悲观。”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外公对自己女儿的恋爱和婚姻持开放的态度。

我的父母年幼时就互相认识，一起玩耍。1927年至1933年，母亲随外公去上海读书，父亲季鸿业则于1930年底至1935年在上海政法学院预科和持志大学法律系学习。两个年轻人异地重逢，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可是，因为父亲还有一个童养媳留下的女儿，所以外公家族里的人都不太同意这门婚事。只有外公力排众议，最后我的父母于1935年结婚了。

1937年，日寇占领上海。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教书转而当律师的父亲不愿当亡国奴，在外公的支持下回到义乌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由于父亲既有“傲人”的学历，又是陈望道的女婿，因而声名远播。一方面，他得到了思想进步、赞成抗日的国民党义乌县长吴山民的看重；另一方面，中共义乌县委的地下党员也纷纷接近他。

1942年5月21日前后，浦江、义乌、金华、兰溪县城先后被日寇攻陷，中共义乌县委号召组织敌后武装进行抗日。因当时正处于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中共义乌县委特别重视发挥民主人士的作用，党领导的新四军浙东纵队金萧支队第八大队即由民主人士担任队长。“八大队”的活动区域涉及金华、义乌、浦江和兰溪四地，因抗日战绩卓著而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父亲在1943年9月至1944年3月期间担任“八大队”队长。

抗战期间，环境艰苦。母亲不仅是父亲生活上的伴侣，更是出生入死的战友。因为同时还要照料孩子，母亲更多的是从事后勤保障工作。

由于日本鬼子丧心病狂，谁家住过游击队就烧谁家的房子，吴山民家就被日寇烧了三次。外公为了不让村民的房产被烧毁，便耗尽家产建了一座“九间头”房屋，供游击队员驻扎和休整。为了方便放哨、观察敌情，还特地在房子的东西两头各开了一扇大大的窗户。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八大队”随新四军北撤至苏鲁根据地，父亲奉命在原地坚持斗争。在特殊的斗争环境中，父亲和战友们数度重建“八大队”，恨得反动派到处张贴布告悬赏1000大洋捉拿。

1948年，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任命为浙赣线“路北县政府”的县长。1949年后，他先后任兰溪县县长、金华专署法院副院长、

浙江省高院民庭庭长。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母亲带着我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与敌周旋、坚持斗争。她无时无刻不牵挂着父亲和战友的安危，最终积劳成疾，于1950年10月2日撒手人寰。所有熟悉的人都称赞她“不愧是陈望道的女儿、季鸿业的知音、一位真正的革命者”。

父亲曾经为母亲写下一首词：明知此味难消受，偏是愁人后，红枫港下够伤人，何苦还求莲叶两相亲？将来春去年华走，痕迹徒然有。若将往事吊伊人，不过两行血泪透衫衿！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母亲的深情。

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回到老家务农。外公经常给父亲去信，鼓励他要坚定信念。信上，字迹工工整整，没有一个潦草字：“虽然你现在觉得委屈，但是你还是应该相信组织、相信党……听说你自学中医，不计报酬为山区人民治病，解除他们的痛苦，这是天大的善事，要坚持做下去。”父亲能够在那个年代始终坚持信仰、努力为百姓服务，与外公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我要向他们学习，过家庭关、亲戚关、朋友关”

外婆蔡葵是一位有学识的女性，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35年，她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和教育学硕士学位，是积极倡导妇女解放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翻译家。她对我们视若己出，无微不至地给予关怀。

在父亲被打成右派等艰难时刻，她用亲情温暖我的心。她说：“只管念好你的书，其他的事情交给我们。”我们在他们身边健康成长，一直到大学毕业。

每当临近假期时，他们都会问我：“什么时候放假啊？一放假就过来上海啊！”一开始，我都照实说哪天放假，于是他们就会在那一天一直等着。如果日程有变，就会非常着急，生怕出什么事。后来，为了不让他们担心，我就故意把放假的日期往后说几天。这样，每次我都会“提前”到达上海，给他们惊喜。

20多年来，我每年假期几乎都会去上海外公家。生活在外公身边，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深入了解他。他一生敬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常说：“我要向他们学习，过家庭关、亲戚关、朋友关，你们都要自力更生。”那时，外公有专用的轿车，外婆有时候出去办点事想叫他顺便带一路，可常常是等外婆拿好东西赶出来时，他的车子早就开走了。

1957年的一天，我在学校的布告栏里看到“著名教育家陈望道先生将于×月×日来我校讲学”的通知，便找外婆确认，得知她“获准”将随外公一同前来后，我非常高兴。可当那天到来时，左等右等都不见他们的身影。跑到校长室一问才知，那天早晨外婆突然生病，外公的讲学取消了。听后我当场就大哭了起来，校长这才知道原来我是陈望道的外孙女。

新中国成立后，外公身居高位，却从来没有为家人谋过私利，包括我们夫妇大学毕业分配时，学校都根本不知道我有这样一位外公。

外公等人用他们的一生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珍藏！（摘自2020年8月4日《解放日报》）

这一方案，并把会址定在了莫斯科郊外。

从4月下旬开始，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们分批前往莫斯科。一路上警察盘问、密探跟踪，危险无处不在。为了保密，从到达会场的那一刻起，每个代表都获得了一个编号，隐匿真实姓名，以编号相称。这也是中共党史上唯一一次。

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开幕。24天会期中，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瞿秋白作了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了农民问题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等多份重要文件。

一项各方广泛关注的修复工程

2021年伊始，记者前往位于莫斯科近郊的五一村探访。公园街18号，一幢黄白相间、颜色素雅的三层欧式小楼在白雪的映衬下愈加美丽——这里就是中共六大会议址。

这幢建筑建于18世纪，因白墙在阳光下显得闪耀夺目，有“银色别墅”的美称。“别墅外面，泉流潺潺，牛羊饮水过去，草带泥痕，四望林木参天”，一位中共六大代表记录了1928年时的景致。

然而，二战结束后，“银色别墅”年久失修，加之两场大火，几乎损毁殆尽。莫斯科建筑师奥梅利琴科说：“我曾经在附近生活过，



1959年1月，周恩来到广东从化看望因病在那里疗养的邓颖超，却发现温泉都被干部疗养院占了，当地的普通百姓难以享受到温泉。他在视察温泉小学时问道：“孩子们有没有洗澡的地方？普通群众有没有洗澡的地方？”负责人解释道：“因为经费困难，还没能给当地群众修建浴池。”周恩来很生气，批评说：“都知道洗温泉好，能治病，可当地群众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地方，却洗不上温泉。你们说，群众会怎么想？你们在温泉边修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们住，我们随时都可以享受温泉，温泉地区的老百姓却洗不上温泉，我和小超都感到不安。”“我提一个倡议，凡是到温泉疗养的同志，向当地捐款，给温

朱良才在晋察冀指导办报

□ 贾晓明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受组织派遣，朱良才前往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任秘书长，营救了一大批革命志士和失散人员。1938年秋，朱良才到晋察冀军区，先后任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分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直接领导下，朱良才全力以赴协助聂荣臻领导晋察冀军区的政治工作。朱良才上任后，经常深入作战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并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宣传党和军区的抗日方针政策，鼓励干部战士战胜困难、坚持抗战，深受指战员的欢迎。

为加强根据地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宣传工作，在聂荣臻的支持和关怀下，《抗敌报》1937年12月11日在河北省阜平县创刊。从1938年1月20日12期起《抗敌报》改为新闻纸，扩成四版，有社论、通讯、专刊、漫画等，形式多样，报道及时，使读者耳目一新。

朱良才主持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工作后，深深感到“办好报纸是政治工作的一件大事”，为办好《抗敌三日刊》（《子弟兵》报）倾注了大量心血。朱良才紧密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精心设计《子弟兵》报的内容，认真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报道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国

内的抗战形势，尤其对晋察冀地区八路军所进行的重要战役、战斗进行了多角度的充分报道和评述。为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子弟兵》报对人民战争的伟大创造——地雷战、地道战、交通战以及在战斗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和事迹、军民并肩作战的动人场面，都予以大量篇幅进行充分报道。

在朱良才的指导和支持下，《子弟兵》报迅速成为晋察冀边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极为重要的宣传鼓动工具和八路军指战员交流战斗经验的平台，对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受干部战士的喜爱。

当时，敌后战争环境十分艰苦，日伪经常对根据地发动“铁壁合围”和“清剿扫荡”。为适应战争环境的要求，《子弟兵》报的编辑都非常精干，通常只有三四个兵，多的时候也不过六七个人。一条土炕编辑部的人可以睡下，一盒菜就够编辑部的人吃。因此，根据地军民亲切地称编辑部为“一盒菜、一条炕的编辑部”。朱良才坚持和编辑部的同志们一起，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与敌周旋，保证了《子弟兵》报的按时出版。

（摘自2020年10月29日《人民政协报》）

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下是一排排长条凳；代表们曾住的房间里，古典风格的木床、写字桌，墙上的油画，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李守义介绍，2016年7月4日开馆以来，展览馆共接待各类代表团1100多个，访客约24万人。

在这里，人们追寻先辈的红色足迹。“我为父亲和那一辈革命人感到骄傲，也为今天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缅怀先烈的情怀所感动。”看到父亲的名字出现在展览里，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十分感慨。

从开馆之日起，展览馆就成为中俄人民开展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的平台，至今已举办演出、展览、联欢、讲座等活动60多场。

记者在采访时遇到了经营画廊的伊琳娜·里亚布什金娜，她向展览馆赠送了一幅取景“银色别墅”的油画。“展览馆开设后，大家常来参观，孩子们在这里参加中国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祝愿中国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中国越来越富强。”（摘自2021年1月25日《人民日报》）

